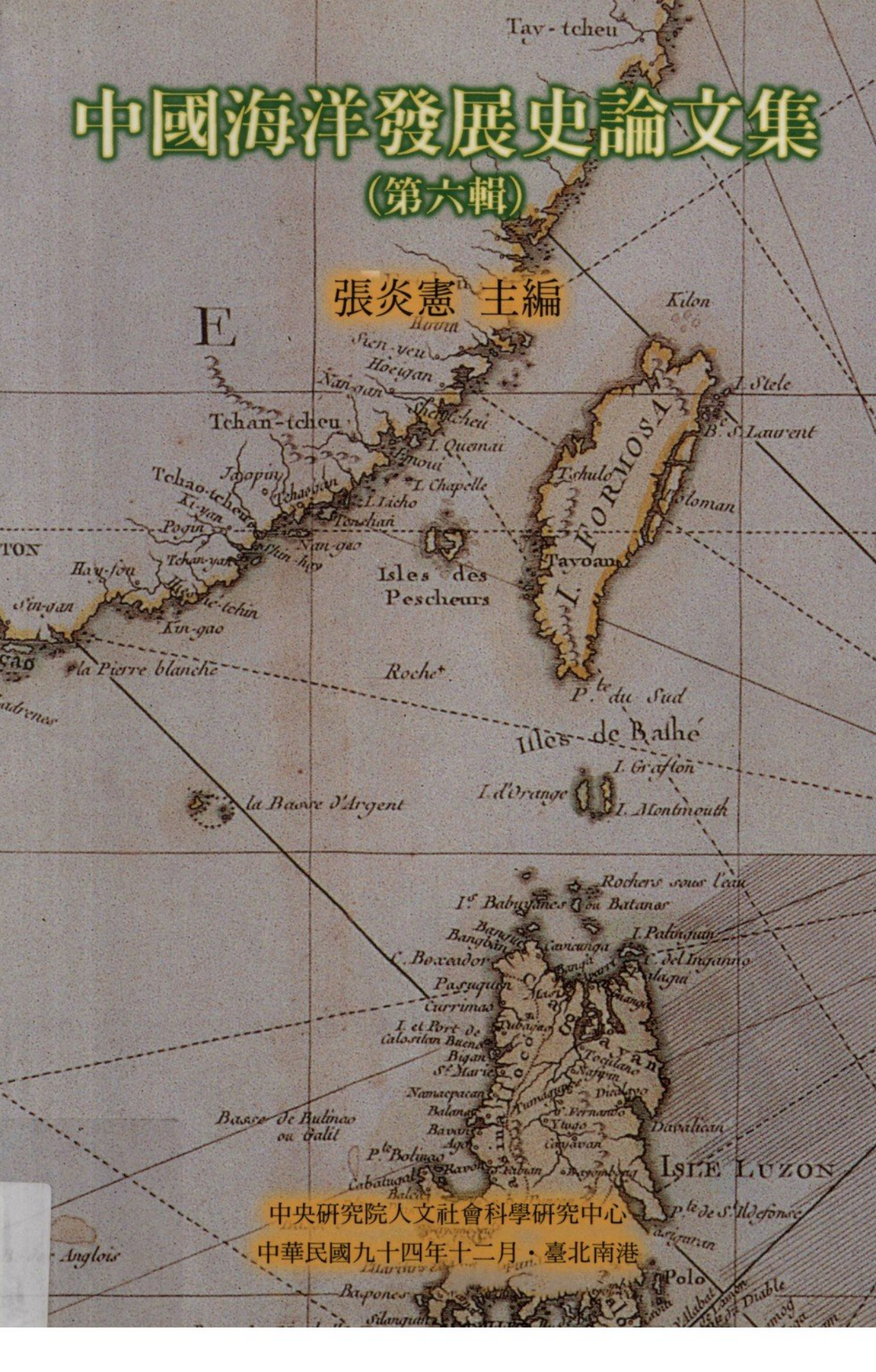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六輯)

張炎憲 主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臺北南港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書(40)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六輯)

張炎憲 主編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臺北 南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 / 張炎憲主編。
--臺北市：中研院社科所，民86
面；公分。--(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專書：40)
ISBN 957-671-482-6(精裝)
ISBN 957-671-483-4(平裝)

1. 航運 - 中國 - 歷史 - 論文, 講詞等
2. 殖民 - 中國 - 論文, 講詞等

557.109207

8600198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書(40)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

主 編 張 炎 憲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郵政劃撥 10317005 帳號 (郵政劃撥手續費請自付)
戶 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電話：(02)2789-8120 傳真：(02)2785-4160
編 輯 者 林蓮治、林容如
校 對 者 林芳如、陳淑媛
印 刷 者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16 號 8 樓
定 價 平裝 600 元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初版二刷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

GPN: 1009403947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序

自一九八四年，本所舉辦「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之後，迄今已有六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包括三個範圍：(1) 中國海外發展；(2) 台灣及其對外發展；(3) 海外華人社會。經過多年來的推動與研討，「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已成爲本所重要的研究主題，且帶動學界的關注與研究趨向。

本輯收錄的論文，是經審查修訂彙編而成，除專題演講紀錄外，分成三大類，共計十五篇。

一

王賡武先生的專題演講〈華裔文化的研究〉是數年來研究東南亞華裔的心得。華裔在西方殖民時期與西方殖民者保持良好關係，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國家獨立，華裔也與新興國家維持友好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勢力興起後，華裔與中國、香港、台灣也保持距離與連繫的微妙關係。華裔能在變化多端的環境下生存發展，有其特殊的經濟力量，是值得研究的課題。王先生認爲不能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等傳統觀念來理解，必需從歷史變遷，重新檢視華裔與中華文化、西方文化或東南亞各國文化之間的互動變容，才能瞭解華裔在東南亞的問題。

二

中國海外發展的相關論文共計九篇。

郝延平先生以巨觀的歷史發展脈絡，分析〈中國三大商業革命〉的關係。自秦漢以降，中國商業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個發生在宋代，第二個在晚清，第三個從20世紀中葉開始。這三個商業潮使得中

國與海洋發生密切關係。宋代商業向東南沿海轉移。晚清時，東南沿海地區商業興盛。當代商業革命則在台灣、香港和海南等地發展。郝先生認為三大商業革命帶動中國從大陸邁向海洋，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被捲入這個潮流。本文以整個東亞華人世界做為歷史分析的舞台，剖論大陸性格與海洋性格的關連性及其特色。

李東華先生繼五代時期吳越研究之後，〈五代南漢的對外關係〉論述南漢立國、經貿發展與對外關係。廣州一時成為商業繁榮之地，但因特權當道、武備不修，缺乏商業發展規劃，無法擴充貿易範圍，廣州貿易反而日漸不振，以致北宋領有之後，嶺南經濟發展未有起色，落後於福建之後。

韓國學者金渭顯先生〈宋麗關係與宋代文化在高麗的傳播及其影響〉，論述高麗處於宋、契丹之間，一面通遼取得利益，一面通宋以輸入先進文物。文中敘述高麗與宋之間的使臣往來、商品貿易和文物交流，而促使高麗在藝術、文學、理學、技藝、醫學等方面的進步，逐漸創造出獨特風格的作品。

蘇基朗先生〈兩宋閩南廣東外貿瓷產業的空間模式：一個比較分析〉，以閩南、廣東的窯數、窯址、外貿瓷產業戶口數、產業運輸、空間距離、生產利潤等分析兩地外貿瓷，認定閩南的部門整合現象比廣東高。

邱炫煜先生〈從《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廣州的海外貿易〉。《大德南海志》是元代陸義齋主修，陳大震和呂桂孫編纂。書中記載廣州與外地貿易的舶貨與物產，計分為七大項。且記載「諸番國」，將之區劃為「小西洋」、「小東洋」和「大東洋」，通商範圍東起越南、菲律賓，向西達到北非的摩洛哥、西班牙等國，航程包括南海海域和印度洋。廣州海外貿易的盛況據此可見。

日本學者濱島敦俊先生〈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透過史料和實地訪查，說明常熟土神李王信仰的形成，與元代漕運、海上交通的社

會經濟發展有關。明末，土神雖仍保留庇佑漕運的傳說，卻漸漸轉為小農共同信仰的對象。這種轉變正是地方民間信仰得以長存永續的原因。

陳國棟先生〈1780~1800，中西貿易的關鍵年代〉，從歐洲強權進入東亞，論述荷蘭、丹麥、瑞典先後退出中國市場，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絕對優勢，以「折抵法案」擴充市場，利用匯款服務，將流通於廣州的白銀收為己用，奠立英國的商業貿易的霸主地位。因此，1780~1800年之間，英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但至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才正式打開中國門戶。

王良行先生〈清末對外貿易的關聯效果(1860~1911)〉，以出口部門的上游關聯、進口部門的下游關聯和消費關聯三者分別論述。上游關聯以茶、絲的生產加工，航運、鐵路、保險和金融四部門的建設來論述。下游關聯則探討進口金屬和紡織品。消費關聯則以三項進口消費品：棉布、鴉片和食米，說明關聯效果。本文之用意是為探討「貿易與發展論戰」，國際貿易對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關連。本文已提供許多數據論證，足供參考。

朱德蘭女士〈近代長崎華商泰益號與上海地區商號之間的貿易〉。日本長崎泰益號店主陳世望家族留下大量的商業書信、電報和帳簿等史料。朱德蘭利用這批史料，說明泰益號在上海地區的客戶；中國棉花、黃豆和日本海產品的流通過程；上海台灣之間、上海廈門之間的商業網路關係，而指出中小企業之間以物物交換或借貸匯票方式來結算，發揮同業間互信交流的精神，使得中小企業能在國際貿易上具有一席之地。

三

台灣及其對外發展的論文共計五篇。



曹永和先生〈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台灣鄭氏政權〉，利用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指出鄭氏擊退荷蘭、領有台灣之後，167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船來台，1672年在安平設立商館。三藩之亂，鄭經西征時，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在廈門設館，西征失利後，廈門商館也撤退至台灣。英國所需的是自由貿易。鄭方所需的是軍需供應和海外物品。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報告書紀錄了鄭氏政權興衰和國際關係的演變情況。

唐立先生〈試論清代台灣生番之歸化與漢族拓墾：以乾隆至道光年間為中心〉，指出漢人入墾台灣之後，侵佔番地，造成漢番間的衝突。生番在壓力之下，乃投誠獻地，清廷藉此出面維護番界安定，建立統治權，漢佃亦乘機租用土地，擴大開墾範圍。生番因此逐漸漢化，喪失其社會文化的特色。

張素玢女士〈台灣中部日本移民村之研究(1932~1945)〉。昭和年間，日本國內經濟恐慌，失業人口增加，為了解決國內問題和南進發展，日本乃以官營方式向台灣西部移民。張素玢以台灣中部為例，說明日本移民到台灣之後，面臨生態環境、社會文化差異性的挑戰，逐漸適應才穩固發展。但因1945年日本戰敗，移民村的日本人全數回去日本，移民事業終告結束。

許雪姬女士〈日治時期的「台灣華僑」(1937~1945)〉，是其「台灣華僑」研究的系列論文之一。1937年，中國與日本發生戰爭，在台華僑處境困難，有人組織「華僑抗日救國會」抗日，有人則組織「華僑新民公會」，配合日本國策，支持汪精衛政權，與蔣介石政權斷絕關係。許雪姬論文詳實敘述在台華僑的轉變情況，據此可瞭解被人忽視的華僑問題。

涂照彥先生〈在國際經濟演變中的台灣經貿關係〉，將台灣經貿關係定位在世界歷史的視野上，以五個「面孔」及台、美、日、中的基本架構，分四個時代論述台灣經貿發展，而歸結出與東洋資本主義的關連性，指出台灣發展的能動力，已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異數，也是以西歐思維為中心的經濟學難於理解的經驗。

四

海外華人社會的研究論文只有一篇，這方面研究有待今後努力。

湯熙勇先生〈德屬薩摩亞招募華工的交涉與中國的保僑設領事(1903~1914)〉。1900年末，德國占領薩摩亞。1903年德國在廣東福建開始招募華工，前後七次，約有3000餘名華工前往薩摩亞。清廷於1909年派駐領事。1914年紐西蘭軍隊占領薩摩亞。湯熙勇利用中文資料，論述華工招募、受虐待、領事派遣與華工地位改善諸問題，顯示清廷對華工問題認知不足，致使華工在外謀生困難。但林潤釗領事認真負責，努力尋求合理權益之做爲，更顯難能可貴。

五

這本論文集能順利出版，應該感謝歷史與思想組同仁劉石吉、李常井、張彬村、湯熙勇等先生的籌劃相助，出版室林蓮治小姐、林容如小姐的打字規劃，和林芳如小姐、陳淑媛小姐的精心校對。在出版之際，突然接到林蓮治小姐病逝的消息。林小姐在病中，仍然爲本書的出版辛苦排版校對，而今書稿付梓，斯人卻已不在，我心中充滿無限感慨，願以此書做爲永遠的懷念。

張其憲

1997年3月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BOOK SERIES

(40)

ESSAYS IN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Vol. VI

Edited by

YEN-HSIEN CHANG

Nank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March 1997



目 錄

編者序

- 華商文化的研究〔主題演講〕 王賡武 1-7
- 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 郝延平 9-44
- 五代南漢的對外關係 李東華 45-69
- 宋・麗關係與宋代文化在高麗的傳播及其影響 金渭顯 71-123
- 兩宋閩南廣東外貿瓷產業的空間模式：
一個比較分析 蘇基朗 125-172
- 從《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廣州的海外貿易 邱炫煜 173-215
- 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 濱島敦俊 217-248
- 1780~1800，中西貿易的關鍵年代 陳國棟 249-280
- 清末對外貿易的關聯效果(1860~1911)..... 王良行 281-347
- 近代長崎華商泰益號與上海地區
商號之間的貿易 朱德蘭 349-388
-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臺灣鄭氏政權 曹永和 389-405
- 試論清代臺灣生番之歸化與漢族拓墾：
以乾隆至道光年間為中心 唐 立 407-428
- 臺灣中部日本移民村之研究(1932~1945)..... 張素玠 429-498
- 日治時期的「臺灣華僑」(1937~1945)..... 許雪姬 499-549
- 在國際經濟演變中的臺灣經貿關係 涂照彥 551-592
- 德屬薩摩亞招募華工的交涉與中國的
保僑設領事(1903~1914)..... 湯熙勇 593-627

華裔文化的研究

王賡武*

華裔文化是一個很大而複雜的課題，我所能談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今天我所談的「華裔」，基本上是指海外的華裔，也就是出國經商者的文化背景，而且主要的重點放在東南亞這個地方。一方面因為我來自東南亞，而我自己以往的研究多數也與東南亞有關；另一方面也因為就我所知，東南亞是世界上華裔最活躍、最成功的地區。宋代以前有關華裔及民間貿易的資料很少，我們對華裔的印象也不多，而宋代以後就不同了，尤其是明清時代。其中我個人比較感興趣的是有關閩南商人在日本、東南亞的一些貿易組織及他們所經歷的各種困難。這些閩南商人都是在未得到政府機構的任何協助之下，靠自己的力量到外地去冒險、去討生活，這和其他國家的商人有很大的不同。就移民史方面來看，華裔占很重要的部分。我認為中華民族的移民主要是華裔的功勞，「華工」、「華僑」都是後來才有的概念。華裔不僅是從一開始就是中華民族移民最主要的成分，我相信在未來它仍將居主導的地位。另外有關華裔文化本身，近來學者多有爭論，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大體來說，一般人都認為華裔文化是指海外華裔的文化。有些學者主張，海外華裔文化與國內商人文化是大同小異的，沒有什麼不同，但我自己則不這麼認為。海外華裔是否發展出與國內華

* 中央研究院院士，前香港大學校長

商不同的新模式？這種模式與他們傳統的文化是否有關？我覺得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開始研究華裔文化時，採用的大多是國外的資料，而國內的資料則相當缺乏。最近大家比較重視了，發掘了許多過去未注意到的資料，例如：地方的資料(地方史、地方志)、家庭的資料(族譜)、社會組織(幫會、商會、宗親會、工會)……等。其他則如最近在東南亞發現的墓誌銘、佛寺、道觀、教會等的資料，使我們有信心對這個題目做更深入的研究。可惜的是，東南亞雖然有很多大商號，但華裔本身所保留的資料卻非常有限。就我們所知，印尼的「建源公司」算是保留資料最多的了，但是它並不是檔案資料，大部分仍是靠黃仲涵他們家人的一些口述史、回憶錄、及經理人的回憶來寫的這一段歷史。在東南亞地區類似當年長崎「泰益號」的大商號不知凡幾，可是卻沒有任何類似「泰益號」的檔案被保存下來，真是非常可惜。早期的資料也許都已不存在，二次大戰的時候損毀了很多，但我個人確信二次大戰以後建立的商號，他們應該會把檔案好好保存。如果我們要研究二次大戰以後的華裔組織、經商方法與模式、文化背景等，以後的資料會愈來愈多。新加坡的「口述歷史館」保留了不少資料，不過這些也都是靠著馬來西亞、新加坡一帶的大商人口述歷史，過幾年這批資料就可以開放，真令人感到高興與期待。

今天所談的基本上是二十世紀的華裔，這只是華裔的一部分而已。最近各研究機構有許多大型的研究計畫是和華裔有關的，例如北京大學正從事《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學、暨南大學、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學、澳洲國立大學等，也都有以華裔為探討重點的計畫在進行。值得一提的是，已經有人針對華裔的家族企業在進行研究。過去，一般人認為家族企業、家族的力量與傳統對華裔的經營與發展而言，絕對是阻力而非助力；其實不一定是如此，這其中有許多精微奧妙之處需要我們更進一步的探討。目前有

多位東南亞的學者，其研究重點就是在這一部分，因此相關的論著很多，未來我們必須把這些研究成果加以比較綜合。

有關東南亞華僑的材料很多，研究的人也多，其他地方的材料則相對的較少。以下我們就綜合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試著為華僑文化的研究整理出幾個重點方向。

首先，華僑的家族企業組織是華僑經營成敗的關鍵，這是一般研究華僑的學者所具有的共識。家族企業組織的經營方式，世界各國都有商人採用，並非華僑所獨有。但是我們深信，華僑的家族企業組織可能有與西方國家商人的家族企業組織不同之處。我們必須去比較，找出他們之間的相異之處。同時，我們發現華僑的家族企業組織是非常靈活的。東南亞各地的政治環境、文化背景、經濟條件都不相同，為什麼有些華僑的家族企業在這種多元、多變的環境下，依然能夠生存、依然能夠紮根、依然能夠繁榮壯大？而為什麼卻同時也有一些例子顯示，家族企業的弱點是促使華僑失敗的「罪魁禍首」？

再者，華僑與其他國家的商人有什麼不同？當然文化背景相差很遠，但最主要的不同還是在於西方國家的商人有政府保護。至少殖民政府、本國政府願意用當地的法律、願意用武力去保護他們的貿易權利。這種來自官方的支持，華僑是完全沒有的，他們只能靠自己的本領、自己的組織去自謀生存。西方商人甚至會享有特權，像荷蘭商人在印尼的特權非常明顯。除了官方的支持外，西方人還可以獲得本國強大的經濟力量、大財團的支持，因而在資金上不虞匱乏。西方商人的大型工、商組織已經發展的相當健全，再加上有本國先進的科技力量為後盾，因而比起華僑來占了很大的優勢。東南亞本土的商人組織很脆弱，大部分的從商者都是貴族或官僚，所以他們沒有獨立的商人文化或組織，而都是具有官方色彩的。所以當東南亞的政權落入西方人手中時，本土商人也就完全垮了，地方的一切經商活動乃轉由華僑來主導。也就是說，在殖民地這段歷史時期，殖民地政府支持西方商人，東南亞的本土商人因為沒有政權的憑藉，不知道如何經商，華僑

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趁虛而入，一方面是西方的代理人、中間人，一方面在土著社會中壟斷了商品批發的工作。而當殖民地時期結束，新興國家出現，東南亞的政權回到本國人手中時，於是又逐漸恢復了原有的經濟活動，也就是由政府或「新貴族」一軍人、官僚、政客來控制國家的經濟活動。因此，如果西方商人或華商要在東南亞經商的話，就必須去和這些新貴族打交道，一切又恢復原狀。這是我們將來觀察東南亞經濟活動時要特別注意的一點。

第三，華商如何適應東南亞當地文化與當地政權結構的問題，是值得注意的。華商從一開始就表明和西方商人不同，絕對沒有政治野心，而且很願意為封建政權服務，很願意和這些官僚權貴來往。這是沒辦法之下的辦法，因為華商沒有任何政治的力量與政府的保障。

海外的華商與國內的商人在文化上有何不同之處呢？基本上，二者是大同小異的。在國內，政權仍在官僚權貴手中，華商如果要經商，就必須與官方維持良好的關係。當華商到東南亞的時候，這種「商人地位低下」的認知（不管當官的是中國人、西方人還是當地土著，要經商就必須與他們來往），恰巧和當地文化契合，所以能適應良好。華商家族企業的基礎也就在此。但這是否意味著華商的家族企業必須永遠服侍官僚、服侍政權，與政權妥協而不可能改變呢？

最後，一般華商認為要繼續經商，尤其是以家族為主的貿易方式，中華文化是必要的，絕對不可能完全歸化為當地社會文化。要和全球各地華商來往、做生意就必須要懂中文，所以即使華文學校在設立上困難重重，自清末以來，華文教育還是一直被保留下來。這不僅是文化的問題與愛國愛鄉的問題，而是在一個實際的觀點上，華商本身必須依靠華文教育才能繼續維持生存的問題。

另外有兩個問題我覺得很有趣，可是自己至今尚未有答案，在此提出討論一下。一個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影響」，另一個是「華商和過去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何關係？」。我們先談「體用」的問題吧！在華商文化裡，所謂「中學」就是華商所重視的中華

文化部分。在華裔文化以家族為主的價值觀裡，非常重視家族的團結、信用、如何講關係、如何利用連結網絡以維繫貿易；在家庭教育方面，重視傳統的「學做人」，這不僅是社會上的需要，也是貿易上的需要。對待遠近親疏、中國人、西方人、土著都有不同的方式，這基本上和中華文化是有密切關係的。我認為「中學」是華裔家族企業的基礎：講信用、吃苦耐勞、有責任感、忠誠的對待家人或外人、敬老等；在宗教信仰上，則拜祖先、接受佛教或道教的傳統風俗習慣，並利用這方面來保持社會上的關係網絡，以維持他們的家族組織。但這不是士大夫的儒學，我們在許多華裔的小傳記中發現他們都提到小時候曾上過私塾，讀四書五經。他們讀四書五經的理由，並不是要學文學或哲學，而是學文字，也就是要識字。大家都要讀一點書，但書也不能讀太多，否則就會影響到他們做生意的冒險性及投機的技巧，只要識字、會算術、會打算盤、講信用就好了。尤其是講信用、敢冒險、膽子大、會投機、有家庭後台，更為華裔所特別重視。此外，雖然他們對內是守舊的，但對外卻講究如何靈活的適應國外文化與環境。重視家庭組織是華裔文化最重要的成分，我想這是無庸置疑的。我們發現即使是第三、四代的華裔，他們可能已經不會講中文了，可能不認識中國字了，和當地人通婚也可能有好幾代了，但是他們的家庭組織卻仍維持著原來的樣子。

到了二十世紀，華裔文化中的「中體」還要再加上新的中華文化，就是愛國、民族主義、新式的現代化華文教育。這些現代化的華校，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崇尚儒學，很多老師都是主張「打倒孔家店」，以西學為主，重視現代科技的發展。東南亞華校很普遍，最初都是華裔主動興建，後來才有官方的協助與推動。華裔與官方的著重點不同，華裔重視識字、讀書、怎麼學做人等，還是具有傳統的華裔文化，保留傳統華裔企業所需的各種特質傳承。官方推動的，例如中華民國政府派遣的教育官員、外交官員，就是著重在愛國、民族主義、及與祖國的關係如何密切等等。所以二者之間常有矛盾產生。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華裔是「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這

主要是爲了適應東南亞的環境變遷。他們一方面儘量學習西方的各項新科學、新技術、新的管理方法與金融制度，一方面又要基本上維持華商傳統的家族企業組織的經營型態。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適應方法，當然也有不同的限制，很值得注意。

最後簡單地談談戰後這幾年的華商文化來做爲今天這場演講的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謂的傳統華商文化已經被阻斷了，新的以民族文化爲中心的「中體」和過去的「中體」大不相同。東南亞國家獨立之後，各有各的需要與政策，因此華商對「新中體」逐漸脫離，又回到原有的傳統家族文化，繼續做生意。同時「西學」在經商上愈來愈重要，每個國家都愈來愈西化，所以華商也就必須去適應、去學習西方的經營方法。新興國家一方面回歸到過去依賴政權來經商的方法，一方面因爲自己沒有自己的商業文化與商業哲學，所以就全盤接受了西方的經營方法。此外，由於華商與中國人的生意往來很頻繁，所以他們也必須隨時注意大陸、臺灣與香港的情勢。我非常佩服華商能在這種變化多端的環境下生存，既要注意當地的軍政經發展，又要注意西方跨國公司的影響，更要注意兩岸三地的微妙關係，真是很不容易。華商要適應每個地方不同的特殊情況，我認爲這不是政治或經濟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可惜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太少了。我希望能看到學術界有關「東南亞華商對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的新文化的看法」之類的研究計劃之推動與進行，就我所知到目前爲止尙未有這方面的研究報告問世。東南亞華人目前約有數萬人在香港經商，關係不可謂不密切，相互關係間如何影響也非常值得探討。

中國自宋代以來就已經有華商在東南亞活動，算來至今也有九百多年了，但這對東南亞的政權結構與東南亞的政治思想，可說毫無影響。主要是因爲華商根本就採取了「不談政治」的態度，所以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在宗教信仰上，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勢力很大，其中有些是因爲與西方商人貿易，由西方商人傳入的。華商的大乘佛教、道教沒有傳教士，因而對東南亞的影響很小。

東南亞的語文中有很多是外來語，但這些外來語主要是西方國家的語言，華文反而很少見，只有越南文有受到華文的影響，但這是因為歷史上中國曾占領了越南很長的時間，並不是因為華僑到越南經商所帶來的影響。馬來文、印尼文中借用閩南話的部分不是沒有，但都不是抽象的或具有思想性的、宗教性的、哲學性的詞彙，而大部分是與貿易有關的，或是飲食、衣著、物產、商品、農工業技術等的日常用語。

現在的華僑文化和所謂的「東亞資本主義」概念，或許應該要合在一起研究。至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現在已經不適用了。我相信兩個極端都是走不通的，華僑真正要在東南亞完全保持中華文化是無法生存的；而如果要華僑完全被同化，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要保留華僑文化，無論如何必須要維持他們以中文為主的生活與貿易方式。如果華僑在東南亞這種複雜的環境下能夠繼續有所發展，我想將來不僅是在經濟上會有很大的貢獻，有朝一日也會出現新的華僑文化，產生更大的影響力量。

